



浙江文献集成



庄守仁集

周谷平 赵卫平 盛玲 编

(第一卷)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文献集成



夏寅承集

(第一卷)

周谷平 赵卫平 盛玲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赵洪祝			
副 主 任	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 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 曦	
成 员	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 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张 曦

执行主任 张涌泉

副 主 任 董 平 方建新 楼含松

主任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徐永明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

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会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

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

4 孟宪承集·第一卷

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

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5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

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前 言

一、孟宪承的生平和教育实践活动

孟宪承(1894—1967),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毕生致力于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际工作,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孟宪承,字伯如、伯洪,1894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武进区),两岁丧父,家境清寒。1900年1月入私塾,后入常州府小学堂读书,1908年8月毕业。同年9月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预科,因学习刻苦和成绩优异,直接升入中院(中学部)学习。1912年7月,他从南洋公学中院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进入南洋公学大学本科深造。他先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半年后改进当时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并于1916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得到该校校长美国人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rt, 1864—1947)的赏识和器重。同年9月,到北京清华学校当英文教员。1918年9月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1920年9月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0年11月赴英国伦敦大学继续深造,刻苦钻研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教育史等学科,同时任中国驻英公使馆书记。在欧洲期间,孟宪承还曾赴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考察教育。

1921年11月,因家庭经济的重负,孟宪承回国就业,先任上海商务大学秘书,后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9月,应母校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邀请,担任该校国文部主任、教授。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孟宪承教授目睹无辜的学生倒在血泊之中,满怀一腔爱国热情和悲

愤,不顾自己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也不顾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以民族大义为重,挺身而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谴责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在与卜舛济的争执、斗争中,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毅然声明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率领爱国学生离开圣约翰大学,与许多爱国志士一起,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上海创办光华大学。同年9月,应清华大学邀请任该校教授。不久辞职南下,于1927年9月受聘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任教授。1928年5月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授。1929年9月被聘为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1930年9月在杭州创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校长,从事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1933年9月后,他又先后辗转在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等校任教。他曾担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职。他曾于1942年当选为国民政府首批29位部聘教授之一,是教育学科唯一入选的教授。

抗战胜利后,1946年浙江大学在杭州复校,孟宪承于9月再任该校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6月6日孟宪承等9人被杭州市军管会任命为接管浙江大学小组成员。8月,浙江大学第一届校务委员会成立,孟宪承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努力、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于1949年10月在浙江大学发起成立“新教育研究会”,研究社会主义教育科学。1950年浙江大学第二届校务委员会成立时,孟宪承连任常务委员。1951年2月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9月,他被调往上海,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教育局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并担任上海市教育学会首任会长。1956年4月被评定为一级教授。

孟宪承在文、史、哲等多门学科上均有很深的造诣,通晓英语和法语,晚年刻苦学习俄语。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就接触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唯物史观。解放后更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活动。尽管他的教学、行政管理和社

会活动极为繁忙,但他总是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受到师生们的爱戴。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他担任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认为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必须经受严格的基本训练,如文献资料的通晓,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掌握,外国语的熟练运用等。他为该校中国教育史专业的发展培养了优秀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中孟宪承遭受“四人帮”的迫害与折磨,于1967年7月19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3岁。但是,后人并未忘记孟宪承的功绩。1978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为孟宪承恢复名誉。1997年6月,由杭州大学教育系教师周谷平和赵卫平编的《孟宪承教育论著选》作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的一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包括蔡元培、陶行知等24位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教育论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数次发表纪念孟宪承的文章。2006年,孟宪承入选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确定、教育部批准的“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首批宣传名单(他是唯一以“教育理论家”身份入选的)。2007年9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专为免费师范生组建的“孟宪承书院”揭牌成立,并决定建立“孟宪承教育图书馆”。当月,“德望师范——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孟宪承生平展”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开幕;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主编的《师范之师——怀念孟宪承》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孟宪承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和第二版均收入的我国近现代教育家之一。2010年6月,孟宪承入选“浙江大学百年文科名家”(首批58人)。

二、孟宪承的教育思想

孟宪承一生写下了约100万字的教育论著,其教育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

(一)大学教育思想

孟宪承的一生主要在大学工作,多年的教学经历使他形成了自己有

关大学教育的思想。通过介绍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分析各国高等教育在组织体系、学科设置、课程安排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现状,比较西方各国高等教育的优劣,他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先进理念引入我国的高等教育。例如在《大学教育》一书中,他从大学的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学位制度等方面比较分析了英、美、德、法四国的高等教育,认为现代大学的理想实际上就蕴含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理想,它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冶”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关于现代大学教育的具体任务,他认为应该主要是“研究”、“教学”和“推广”这三大任务。现代大学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贡献,除了体现在研究和教学这两大任务之外,也应适应平民主义的要求,“推广其知识于它的‘宫墙’以外,而有所谓‘大学到民间去’的运动”。

在大学教育的目的以及为什么要进大学深造等问题上,他明确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求得高深的学问,走上研究的大道”。这既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青年之所以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含有两种紧要的目标:一是在教学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在课程上比一般学校要深奥些,因此要促使学生求得丰富的知识;二是在研究方面,就是要发现新的学术,增加新的知识,这也是大学教育目的中最为重要的。基于这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当时我国的国情,他反对社会上对大学教育的过度追捧和高校发展的盲目扩充,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更应从自身的条件出发,特别是要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时间精力、兴趣爱好等方面的情况来决定是否上大学。

在长期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他清醒地看到当时我国大学教育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也深入分析了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它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上的不足。他认为我国大学教育在学生进大学前和欧美国家相比没有预备年限,导致大学学习的年限相对过短;且在课程设置方面,常常按照习惯的标准,不利于学生在大学期间获得必要的知识。因此,他认为做好上大学的准备非常重要,即:知己、知彼和学问的准备。特别是在学问的准备过程中,既要注重对外语和数学等工具性知识的学习,为今后的大学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更要养成学习上的专心、恒心和细心。他在江苏扬州中学作关于我国大学教

育的专题讲演中,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求学要专心才能领悟学问的深奥微妙处,有恒心才能获得学问的成功,能细心,求得的学问才正确,才不错误。”二是教学上的缺陷。在教学过程中,他批评了我国大学教学过程中多采用“讲演式”的教学方法,偏重于课堂上的讲解,而很少培养学生自身研究学问的方法和能力,教师也很少对学生进行学习上的辅导,使学生缺乏学习的自觉性,因而很难研究大学里高深的学术问题。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在教学方法上应注重对学生个体学习的指导。三是师资上的薄弱。他认为由于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历史较短,客观上缺少具有广博经验和学识的教师,和欧美国家的大学教师相差甚远。而且大学教师因薪俸和任期的不稳定常常兼职兼课,无心进行学术研究。这样,教师既没有丰富的经验与学术,又不能专心致志地上课,就会影响到大学教学的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对此,他认为大学教师要“甘受一点苦痛,藐视一切兼职兼课的外缘,认清了自己对于教育和学术的使命,而不懈地执行着这使命”。只有这样,大学教师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二) 民众教育思想

民众教育是孟宪承着力最著的领域之一,他的论著中有相当篇幅是论述这一问题的。他认为,民众教育的实质就是使民众能适应其继续不断的生活,“民众自身感觉的需要,我想,就是民众教育的出发点”。因此,首先要具体地分析和研究民众的全部生活情形,要亲自到民间去,与他们生活在一处,然后才能制定教育之目标。就当时中国民众的实际状况而言,实施民众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其中心内容应是提高生计,满足娱乐,这是民众最切身的需求。提高生计,就是用职业教育推广科学技术,在乡村注重农业补习,在县市注重工商业补习;而满足娱乐,则要寓教育于种种娱乐之中,培养公民精神。同时,孟宪承还清醒地认识到:“民众的生计和娱乐的需要,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等全部问题,更不是单靠教育的机关,便能独自供给的。”

孟宪承民众教育理论的基础是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心理科学方面来说,他承认环境和遗传有同样重要的影响,智力的高低无法决定

教育机会的多少;这里还有一个年龄和学习的问题,“在任何年龄的学习,都有同等的可能和必要”。从社会科学方面来说,他认为,若经济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则民众教育就很难推进。

孟宪承还就民众教育的组织机构、实施办法、教材、师资、经费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民众教育的形式上,他提倡民众学校教育和民众社会教育并举,主张采用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和民众教育实验区等多种组织形式。在民众教育方法上,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挥各类团体的教育作用,启发民众的自觉性。

孟宪承不仅在理论上积极探索中国式的民众教育之路,而且身体力行,投身于实际的民众教育运动。他先在杭州创办了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亲任校长,培养各县的民众教育工作者。后在江苏的北夏实验区主持系统的民众教育实验。在实践中,他深深地体会到,“真实的教育,必须在农人的实际生活里进行。只有把握住他们的实际生活问题,帮助他们逐渐满足生活的需要,由做而学,由行而知,才能够显现教育的功效”。(《北夏实验区的最近》)

(三)其他方面的教育思想

孟宪承重视师范教育,认为培养师资、提高教师的思想和学术水平是办好学校的根本。他曾说:“现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把教育看做国家的命脉,没有一个不尽力从事师范的培养;为改进中等教育计,没有一个不在高等教育里,供给师范的训练。”(《教育学科在大学课程上的地位》)教育是引导学生发展和传衍社会文化的事业,维系着民族的前途。所以,教师应热爱学生,并以自己的教学服务于社会。教师不仅要掌握所教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等教育科学知识。

留学英美,学贯中西的功底,使孟宪承对中外教育有独到的了解、比较和鉴别。他主张有借鉴地吸取外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反对不顾国情,亦步亦趋。他曾翻译与撰写了许多介绍外国教育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的论著,内容包括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教育著作、各国教育发展概况、各种新教育实验、教育方法及成人教育和民众教育等。他指出,当时国内教育界对世界新教育思潮的探究和学习,其坏的方面(即盲目的模